同性恋现象的另类书写
——《弁而钗》中的“南风”及其文化解读

程 豆 豆

(陕西理工学院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1)

摘 要:《弁而钗》是晚明时期的一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与明清时期传统的同性恋书写不同,该书作者对同性恋现象持同情、理解甚至赞赏的态度,因而展示的是一种特殊的同性情感关系。作者突出了同性恋者的至情至性,小说中的几位主人公品性高洁、俊逸不凡,他们之间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在人格上也是平等的。作品中塑造的小官、优伶形象,也摆脱了以色图财牟利的传统模式,不仅洁身自爱,而且知恩图报。《弁而钗》中“南风”现象的特殊化,体现了士人审美情趣和社会各阶层价值观念的一些微妙变化,具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弁而钗》;同性恋;人格平等;心理认同;审美情趣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785(2013)11－0022－05

明清时期,男性同性恋现象在社会上普遍流行,所谓的“南风”[①]也成为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话题。在明代的《挂枝儿》《山歌》等民歌集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同性恋题材,专写“南风”的小说也随之出现。这一时期的同性恋小说,如《龙阳逸史》《宜春香质》等,情节粗俗,人物塑造低劣,但“醉西湖新月主人”的《弁而钗》虽也描写了世人对男色的狂热追求,却与其他同性恋题材小说迥然不同。该书描写了一种特殊的同性情感关系,全书分为“情贞”“情侠”“情烈”“情奇”四卷,讲述男性之间的至情至性,塑造了几位品性高洁、俊逸不凡的主人公形象。作者同情、理解同性恋者,认为他们之间是平等的人格对话,存在真正的情感。《弁而钗》中“南风”现象的特殊化,体现了士人的审美情趣和社会各阶层价值观念的一些微妙变化,具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明清小说中的同性恋书写

从古到今,男女之情皆为伦理之常。唐代诗人白行简在《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中就认为“男女交接故而阴阳顺”。在传统社会中,男女之情才合乎情理,同性恋则一直被否定、甚至被厌恶。“男女居室,为夫妻之大伦;燥湿互通,乃阴阳之正窍。迎风待月,尚有荡检之讥;断袖分桃,难免掩鼻之丑。”[1]135 异性恋者认为断袖分桃之事是有悖天理伦常的行为,劝诫人们应当回归正统,这一心态也反映在文人的创作中。

《龙阳逸史》是明代的一部影响较大的男性同性恋题材小说,作品记述了二十个男娼的故事,全面反映了当时“南风”盛行的状况。作者不厌其烦地介绍各种玩弄小官的性行为,同时揭露了小官见利忘义、贪得无厌的行径。醉西湖新月主人曾在《宜春香质》中对这种以色事人的性交易做了极端的批判:

> 博观情书,广罗情海,独无解于龙阳一道。男专女淫,阳柄阴政,红颜少妇,起谁适为容之悲;白面郎君,甘我见犹怜之丑。倒男儿之纲,并紊女真之纪,颓阳明之气,并乱阴顺之节。归之人类,恐乱人际,列之畜道,虑乱畜群。人而狐,狐而人。非人非畜之间,此辈之姻缘在耶?

收稿日期:2013-06-08

项目基金:陕西理工学院 2013 年校级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明代婚恋题材小说的文化解读”(项目编号:SLGYCX1303)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程豆豆(1989—),女,河南许昌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否耶？敢以质之高明。[2]653

作者将“龙阳一道”视为扰乱人纪甚至畜群的怪物，充分流露出对男色的不屑与厌恶。《宜春香质》亦以《风》《花》《雪》《月》四集描述小官的无情无义。痛斥孙义朝三暮四、“荡情年少”、“好色乱淫”，伊人爱翻脸无情、“诱人钱财”、“淫人妾婢”。文中小官下场凄惨，嫖客人财两空，这些都体现出作者对同性恋嘲弄的的态度。

这种丑化甚至妖魔化同性恋的现象在其他小说里也大量存在。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有这样一段描写：

某公眷顾一娈童，性婉柔，无市井态，亦无恃宠骄纵意。忽泣涕数日，目尽肿。怪诘其故，慨然曰：“吾日日荐枕席，殊不自觉。昨寓中某与童狎，吾穴隙窃窥，丑难言状，与横陈之女迥殊。因自思吾一男子而受污如是，悔不可追，故愧愤雨死耳。”某公譬解百方，终怏怏不释。后竟逃去。[3]261-262

根深蒂固的两性观念使这位娈童羞愤欲死，因为看到他人丑态而联想到自己，最终改“邪”归正。由此可见，明清时代的文化氛围对南风大多持斥责态度，这一时期的文人在作品中大量描写同性恋现象也多出于猎奇、赏玩心态。在《童婉争奇》中，妓女因为“小官”群体的存在威胁到其生意，就怒骂小官“以男身侍人”，双方对簿公堂，但判官史典大人不好男色，就判小官败诉并贴出禁男风的告示。作者始终用嘲讽的语气描写小官与妓女争抢嫖客的丑态。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时期同性恋题材作品大量出现，表明男性同性恋风气的盛行，以至于有“有歌童而无名妓”、“阴妖遍天下”之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同性恋现象虽然存在于各个阶层，但人们却并不认同，并且首先对同性恋中的被动方发难。被动方一般是由家仆、优伶甚至男娼担当，地位低下，而且在性行为中扮演女性角色，因而为世人所不齿。被动方也被称为“娈童”或者“娈宠”，从这带有强烈狎玩色彩的称呼就可以发现，同性性行为的被动方与主动方不仅存在着地位上的差异，还有人格上的不平等。文人士大夫在其文学作品中也将矛头更多地指向同性性行为的被动方，认为他们甘愿雌伏是带有不良动机的，或为权力交易、或为金钱诱惑。“凡女子淫佚，发乎情欲之自然。娈童则本无是心，皆幼而受绐，或势劫利饵言”[4]315。这一认知体现于当时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红楼梦》中薛蟠与香怜、玉爱交好，贾琏拿清俊小厮“泄火”。“香怜”、“玉爱”是因为金钱利诱，而小厮则是不敢忤逆上位者的要求。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多将同性恋被动方塑造成唯利是图的形象，劝诫世人大可不必痴迷于娈童。

二、《弁而钗》中特殊的“南风”现象

《弁而钗》开头即点“始以情合，终以情终”，“大为南风增色”，作者尽情讴歌有情之人，赞美褒扬专情小官的忠贞不渝与高洁品行。

《弁而钗》中塑造的同性恋双方，大多社会地位较高，或为书生、或为武生、或为侠士。即便是落魄风尘的戏子、小官，亦是出身官宦、读书好学、洁身自爱。如卷一《情贞记》中的书生赵王孙与当朝翰林风翔，卷二《情侠记》中的武生张生与秀才钟图南，卷三《情烈记》中的戏子文韵与风流才子云汉，卷四《情奇记》中的小官李又仙与侠士匡时。《弁而钗》中不论是同性恋的主动方还是被动方，都与明清其他同性恋的描写大不相同。

这一时期关于同性恋的书写，大部分为有同性恋行为而非同性恋者。在同性性行为中，主动方多为上位者，自身拥有权力财势，他们一般都是双性恋者，有家有室，一般都是为了满足畸形的猎奇心态，或者为了追赶潮流，才将目光投向年轻貌美的男子。《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有一书童唤作小张松，生得清俊，面如傅粉，齿白唇红，又会写字，擅长南曲，于是西门庆将其收为男宠。西门庆有多房姬妾，偏爱女色，但他与外貌柔美的小张松也有实质性行为。西门庆对其男宠更多是满足他对男色的猎奇心态，追求性刺激。

被动方多为社会阶层低下的人，出身微寒，以出卖色相为生。他们与主导方之间的关系多以满足情欲为主，缺乏精神上的沟通与交流，只是金钱、权力与男色的交易。他们的这种行为，与其说是同性恋，还不如用“性交易”来得更为贴切。如《龙阳逸史》中，初出道的小官唐半瑶游走于不同的嫖客之间，价高者得之。先由碧莲寺长老牵线包给徽州朝奉汪通，然后在老乔头的撮合下，投入城内富家子弟汤信之的怀抱，为了金钱成为不同人的性奴隶。

《弁而钗》则打破了这一书写模式，在书中体现出了人格平等的意味，作者从“钱”与“欲”上升到“情”。书中的主人公摒除了由主仆关系、金钱交易、权色交易带来的同性性行为。第一卷和第二卷重点描写同性恋双方在对等的社会关系和情感之下的爱情，第三卷和第四卷描写的同性恋被动方虽然是地位低下的戏子或者小官，但他们不为金钱或者权力所动，洁身自爱，知恩图报，这一文学形象有别于明清同性恋小说中所塑造的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戏子小官形象。卷一《情贞记》中风翔说：“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今日之事，论理自是不该；论情则可男可女，女亦可男，可以由生而死，亦可以自死而之生，局于女男生死之说者，皆非情之至

也。”书中始终贯穿一“情”字，试图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一种有别于其他小说的特殊的南风现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主要有两个特点：

（一）同性恋双方品貌相当、人格平等

《弁而钗》卷一与卷二里，同性恋行为双方皆为读书人。明清时期，男性性爱风气流行于各个阶层，士子文人之间更会因仰慕对方的才识、品貌而产生同性爱。《红楼梦》中宝玉初见秦钟，就赞叹对方风姿，将自己比作“泥猪癞狗”，宝玉与秦钟结交，产生了高于友情的同性爱，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秦钟出众的品貌。

流行于读书人之间的同性爱，行为双方品貌相当、才华相当，这种同性爱在当时不仅不受人们鄙视，还被认为是名士风流。《弁而钗》卷一主人公赵王孙与风翔看似相识于书院，实则是风翔在路上看到赵王孙“丰神绰约，体貌端庄，耀人新貌。”风翔首先被赵王孙的品貌吸引，“神魂已随之飞越矣”。然后派小厮打听是谁家子弟，掩饰翰林身份以学生身份与赵王孙共读一家书院，进入书院以后，发现赵王孙不仅相貌清俊，更写的一手好字，才华出众。然而因为赵王孙并不是小厮或者随从，可以任意相欺，风翔久求不得而害了相思病。最后赵王孙感动于风翔的情谊，才接受了风翔的感情。

风翔虽因为赵王孙的品貌而心生爱慕，却始终恪守礼仪，不敢有半分轻漫之意。风翔不以翰林身份威逼利诱，坚持以情待之。以同窗身份与之相交，两个人的人格处于平等地位，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金钱权色交易。这与第二卷《情侠记》有相似之处，武生张机文武双全，被秀才钟图南迷奸，张机本欲用利剑刺杀钟图南，但被钟秀才一片痴心所感动，反释前嫌，与之交好。张机早已成家娶妻，说明他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同性恋者，他是一个重情之人，感动于钟图南的痴情。张机虽委身钟图南，却在陕西战乱时率军将其救出，尽显男儿本色。张机对钟图南之情，可将生死置身事外。他们之间的同性情感，建立在人格的平等之上，虽然在性行为中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但是并没有导致心灵上的不平等。

作者对有情之人，始终持欣赏、赞扬态度。《弁而钗》中，赵王孙与风翔并立于高堂之上，后来弃官归隐，子孙世代相好。张机与钟图南也是弃官归隐，两家世代联姻。书中以“至今天津以为美谈”作为点评，明确表达出作者对这种同性情爱的褒扬。

（二）同性恋被动方品性高洁、知恩图报

与传统同性恋小说中小官唯利是图，为了金钱而出卖肉体不同，《弁而钗》卷三、卷四塑造了两个不同身份，却有相同之处的人物形象：戏子文韵和男妓李又仙。文韵和李又仙虽然身份低贱，但都出身于官宦之家，于风尘之中洁身自爱。这一点符合了大众心中有情之人的形象，博得人们同情，自然将本性善良、誓死守卫贞洁的文韵和李又仙与其他作品中的小官形象区分开来。

明清时期同性恋文学作品中塑造了大量丑恶嘴脸的男娼形象，小官们为了金钱，游走于嫖客之间，没有廉耻道德。《宜春香质》就描写了小官对金钱的追逐丑态：“如今世事一发不好了，当时相处小官，以为奇事。如今小官那要人相处，略有几分姿色，未至十二三，梳油头，挽苏髻，穿华衣，卖风骚，就要去相处别人，那要人相处他？”[2]622《弁而钗》中文韵虽卖身戏班，却不畏强权，保全自己清白之身，后又知恩图报，帮助云汉考中进士，最后于南海得道，终成正果。李又仙沦落南院，被迫接客，侠士匡时将其救出，为报大恩，他男扮女装十七年将匡时之子抚养成人，后来入山修行，羽化成仙。两人的地位都很低贱，但都因为洁身自爱、知恩图报而修成正果，这与以往小说中男娼优伶凄惨的下场大不相同。醉西湖新月主人在书中加入了神鬼情节，一方面表达自己支持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大众对于同性恋的心态：反感厌恶权色交易、金钱交易，接受赞同有情、重情之人。《弁而钗》中的同性恋主导方都收获了爱情，而且在情人的帮助下，家业兴旺。作者用赞美的词句、精妙的构思，描绘出人们心中完美的小官形象：美貌、忠贞、才学集于一身的男佳人。

三、“南风”现象所反映的文人心态

明中期以后，道德观念开始冲破宋儒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束缚，伸张自然情欲的主张开始悄然萌芽。李贽提出“童心说”，提倡人应该有“赤子之心和真实情感”[5]。在此基础上又倡导“天理即人欲”，认为“食色性也”，追求物质、为自身谋利是人的天性，对人欲表示充分肯定，认为人应该表达和释放来自内心和本性的情欲。这一思想潮流使男色爱好者毫不避讳地将自己的癖好公布于众人，于是“南风”大盛。吴存存在《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中提出：“明中晚期的那种冲破一切道德规范的束缚、刻意追求新奇和刺激的社会思潮促成了男性同性恋的泛滥。热衷于这种性爱风气的人员上至帝王公侯，下至庶民百姓，而士人是其中最为活跃的领导时代潮流的阶层。”[6]115 这一时期，士人阶层开始对男色现象的态度有所改观，并对同性恋群体有较为客观正确的认识。产生这种认识的原因可分为两种：

（一）文人特殊的心理认同

明清时期，“南风”盛行，上至帝王相将，各级官吏，名流雅士，下至士农工商、普通百姓，包括小商贩、农民、奴婢小厮、优人乐工，还有和尚道士尼姑、市井游

民、流浪者,如此等等,无一不卷入了性纵欲的风潮[7]。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出现了一批个性张扬的文人,他们“大多特立独行,追求一种不拘礼节、潇洒率性的生活”[8],坦言自己对男色的喜好。晚明散文大家张岱就公然承认自己年轻时“好美婢,好娈童”。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也喜好男色,并对此事胸怀坦荡,其南风韵事见诸于各种诗作,与其弟子刘霞裳的情谊更是著录于《小仓山房诗集》。袁枚本人为当朝名士,与弟子刘霞裳相恋,师生同床共寝,共游天下。这种名为师徒,却状似夫妇的同性关系在明清时期的文人中不难见到。刘霞裳与文化修养低俗、只能做皮肉交易的娈童不同,他是袁枚青睐的知己,年轻貌美,出身书香门第,是腹有文采的儒雅之士。与袁枚志趣相投,能够产生心灵上的沟通。

明清时期,文人对流行于文士之间的同性爱很大程度上持包容态度,文士之间的同性爱恋不参杂任何利益,双方大多是被对方品貌、才德所吸引,有共同爱好和人生理想,这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认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钟情于秦钟,其根源在于宝玉内心深处想要寻找与自己类似的人群,追求一种认同感。他被身边人讥讽为”孽根祸胎”,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叛逆思想得不到理解与支持,时常感到孤独,因此需要找到志同道合的“战友”。压迫得越厉害,反抗就越激烈,正如对女性极端的爱一样,宝玉对于欣赏的男子也会倾注极端的爱。这种同性之间相互爱慕出现的原因是因为他与这些男子之间有共同的理想,他们之间存在某种相互吸引的特质。

这种流行于文士之间的同性爱得到了大多数文人的理解和赞扬,随之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弁而钗》“起于色而终于情”,小说中的主人公个个品貌不凡。如书赵王孙“发甫垂肩,黑如漆润,面如傅粉,唇若涂朱,齿白肌莹,衣冠楚楚。”;风翔举止儒雅,人物洒脱;张机相貌英俊,仪表非凡;钟图南亦风姿美貌,多才多艺;文韵人品出众,装束自然华丽;云汉也是貌步潘安,才希苏轼;李又仙相貌俊秀,腹有文采;匡时豪侠大方,济危扶贫。风翔被赵王孙的美貌吸引,钟图南为张机的英姿倾倒,他们之间有共同点,即皆才貌双全,被对方吸引,进而情感升华。作者通过《弁而钗》不仅体现了读书人之间互相吸引、互相认同的特殊心理,还虚构了近乎完美的小官文韵和李又仙,将他们的洁身自爱、知恩图报与现实社会中的虚情假意、重利轻情的小官做对比,勾画出一个至情至性的乌托邦世界,以追寻心理认同感。

(二)文人独特的审美情趣

明清之际,优伶文化发展迅速,名伶辈出,成为人们狂热追捧的对象。这一时期诸多文人雅士承袭明人遗风,成为追捧名伶风气的积极倡导者。在与优伶的交往过程中,文士大多以欣赏的姿态出现。名伶不仅要貌美,还要善解人意,才学出众,这才符合文人的审美情趣。明清时期的优伶,倾向于极端女性化,优伶的肌肤、五官、体态、嗓音都要求肖似女子。《燕都梨园史料》中就记载了当时培养优伶的程序:

> 凡新进一伶,静闭密室,令恒饥,旋以粗粝和草头相饷,不设油盐,格难下咽,如是半月,黝黑渐退,转而黄,旋用鹅油香胰加洗擦。又如是月余,面首转白,且加润焉。[9]624

优伶与文人交往多为雅游,与文人探讨诗词歌赋,少有性行为。这与《红楼梦》中所谓的“意淫”有异曲同工之妙,《红楼梦》脂批本认为情与淫水火不容,世人多将情误认为淫,却不知“淫里无情,情里无淫”,应该是发乎情而止乎礼。

名士在名伶面前是温柔多情的风流公子,可以尽情挥洒同性爱情的浪漫情怀。因为不牵扯钱色交易,文士认为他们与优伶是对等的人格关系,进而催生了众多文士与名伶之间的佳话。如清代诗人吴伟业与昆剧伶旦王稼。王稼精于歌舞弹唱,曾出演《会真记》红娘一角,色艺俱佳:“锁骨观音变现身,反腰贴地莲花吐。莲花婀娜不禁风,一斛珠倾宛转中。”王郎不仅颠倒众生,更成为诸多名士贵族追逐的对象,吴伟业曾为王稼作《王郎曲》:“王郎十五吴趋坊,覆额青丝白晰长。孝穆园亭常置酒,风流前辈醉人狂。”表达自己的倾慕之情。这一时期文人名士对优伶的狂热追捧体现了他们审美趣味的变化,文士与优伶之间的来往是风雅而纯洁的,文士通过与优伶的交往,将才华展示给优伶,使自己的文采得到别人认同。士人还巧妙地将自己的优越感通过品赏优伶的形式体现出来,得到身份地位和心理上的极大满足。

这一独特审美趣味在《弁而钗》卷三“情烈记”中亦有所体现。文韵扮正旦,穿女衣,赢得满堂喝彩,书中写道:

> 但见额里包头,霏霏墨雾,面搽铅粉,点点新霜。脂添唇艳,引商刻羽,启口处香满人前;黛染眉修,锁恨含愁,双蹙时翠迎人面。[10]878

这一装扮,迎合了大众的审美情趣。任何一个时代,审美潮流总是先风行于上流社会,及至士大夫、文人,文士将主流审美情趣写成文学作品,使之得以广泛传播。此时大众审美情趣的嬗变体现出文人士大夫当时独特的审美情趣。

《弁而钗》中同性恋行为中的主被动方,一反传统男性阳刚之美,动辄以“望之如美妇人”来夸赞主人公的相貌。爱好追逐女性化的男子,这成为一时风气,体

现了文人独特的审美情趣。

《弁而钗》倡导“至情”论调，所刻画的主人公可为情生，可为情死，在以同性恋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中开了先河。对于男风大盛的现象，社会各阶层虽然不认同，但至少已经有人开始主动调整自我的观念与行为方式，试图容忍、宽容这一现象。文人创作心态也随之改变：“从把同性恋丑化、妖魔化，到试图宽容、理解与同情，再到对对等、互爱的同性恋产生审美与认同。”[4]477 虽然小说中的一些观点，诸如“文韵为保名节自缢”、“李又仙男扮女装抚养恩公之子”都充斥着男权思想，但作者对于“至情”的同性恋群体持支持、赞扬态度，可以说带有一定的人文色彩。《弁而钗》将同性恋双方塑造成人格平等的读书人，将文人心理认同和审美情趣融入创作，可以说是一次大胆的创新。

注释：

① “南风”之南首先是指南方，又与“男”字谐音，隐含男子之意，是流行于南方的男子同性恋之风。明清四部专门写男子同性恋的小说《龙阳逸史》《宜春香质》《弁而钗》《品花宝鉴》中的男风故事多发于福建闽南地区，故称为“南风”。

参考文献：

[1] 蒲松龄. 聊斋志异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醉西湖新月主人. 宜春香质 [G]// 侯忠义. 明代小说辑刊. 成都：巴蜀书社，1995.

[3] 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 施晔.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 张思齐. 李贽《说书》与明代八股文 [J]. 西华大学学报，2009(4).

[6] 吴存存. 明清社会性爱风气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7] 周钧韬.《金瓶梅》是一部性小说——兼论《金瓶梅》对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的全方位揭示 [J].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9).

[8] 漆娟. 李白妓女诗与唐代隐逸文学 [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2(4).

[9] 艺兰生. 侧帽余谭 [M]//张次溪. 燕都梨园史料.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

[10] 醉西湖新月主人. 弁而钗 [G]// 侯忠义. 明代小说辑刊. 成都：巴蜀书社，1995.

An Alternative Description of Homosexual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Nan Feng and His Culture in *Hairpins on Men's Hats*

CHENG Dou-dou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Shaanxi, 723001, China)

Abstract: *Hairpins on Men's Hats* was a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in vernacular Chinese with homosexuality as its subject in late Ming Dynasty.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description of homosexuality, its writer highlighted homosexuals' admiring temperament. Some protagonists of the book have lofty characters and are different from the common people. They have exchanged their affections and are equal in personality. The images like Xiao Guan and You Ling have got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making money through beauty. They not only have their self-esteem, but also are grateful to those who have helped them. The unique figure Nan Feng has shown some minute change of aesthetic inclination of scholars and values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classes, and ha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Key words: *Hairpins on Mens' Hats*; homosexuality; equal personality; psycho-recognition; aesthetic inclination

（责任编辑：王建平）